

XUESHENGDUWU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

爱国者的悲歌

——《离骚》导读

余丽明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爱国者的悲歌

——《离骚》导读

余丽明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爱国者的悲歌

——《离骚》导读 余丽明 编著

责任编辑：何伍鸣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25 字数 91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编：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普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18]
思想和艺术特色 [66]
《离骚》注译 [89]

故事梗概

楚辞简介

“楚辞”是在《诗》（《诗经》）三百篇以后产生和流行的一种新诗体。它是战国时代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间歌辞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而来的。

“楚辞”这一名词产生于什么时候，现在已无法考证。较

早的是《史记》曾提到它。据推测，最起码是汉初就有了“楚辞”一词。到汉成帝时，刘向奉敕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这一部诗歌集的名称；而集中各篇诗歌所用的诗体也称为“楚辞”。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把“楚辞”称为“赋”，或“辞”、“赋”并举，称为“辞赋”。其实这是不恰当的。“楚辞”和“汉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组织结构、押韵规律各不相同。《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辞与赋还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原、宋玉之楚辞与枚乘、司马相如的汉赋等同起来。因此，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楚辞也往往被称作赋，而屈原创作的全部诗歌被称为“屈赋”。“屈赋”一词沿用至今，流传广泛，似乎已成为屈原诗歌的简称。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学习阅读屈原的诗歌，可以发现，凡是有关屈原一个人的诗歌的注、译、考证研究这一类的著作，其书名很多都使用“屈赋”一词；而若是屈原及其他人写的楚辞体诗歌合在一起注、译、考证研究，则书名一般称为“楚辞”。例如：《屈原赋注》（清·戴震）、《屈原赋今译》（现代·郭沫若）、《屈原赋校注》（现代·姜亮夫）；《楚辞章句》（东汉·王逸）、《楚辞集注》（宋·朱熹）、《楚辞通故》（现代·姜亮夫）等等。

楚辞这种体裁又可称为“骚体”；楚辞体的诗歌可称为“骚”。如《屈骚指掌》（清·胡文英），这里的“屈骚”就是

“屈赋”，即屈原创作的诗歌。《骚筏》（明·贺贻孙），此处“骚”不但包括屈原的作品，还有宋玉等人的诗歌，“骚”在这里当然也就等于“楚辞”之意。

在屈原乃至楚辞的全部作品中，最杰出的作品，无疑是《离骚》。《离骚》在文体上，最能代表楚辞的特点，而且在思想内容、创作手法上也是全部楚辞中成就最高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后人习惯上把楚辞体诗歌称为“骚”，楚辞体称为“骚体”。以一首诗歌来称代楚辞全体，可以想见《离骚》在诗歌史及人民的心中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楚辞”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偶然形成，它的产生自有其复杂的因素。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在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形成了浓郁的楚国地方文化特点。同时，春秋以来，楚国又与中原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促进、发展了楚民族文化。“楚辞”的产生是南北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

首先，“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民间语言和音乐——所谓楚声和楚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楚国的民间歌舞非常盛荣，而极好神鬼祭祀的传统又使楚国的音乐歌舞更加发达。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楚国的音乐和民歌就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中记载过楚国乐师钟仪被北方强国晋拘囚，他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楚国的楚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文献上记载了许多楚歌，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等，在一些楚辞

体诗歌中也有提及。就现存“楚辞”来看，未必都可配乐入歌，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各章的名称。既然楚辞中仍还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楚辞和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能楚辞最初也就是楚歌的歌辞，以后由于屈原等文人的努力，使之分离出来，文学化，成为独立的诗歌形式。

既然诗人们创作的是楚辞，则使用的当然是楚地方言，因此楚辞的语言必然体现出浓郁的楚地方言的特色。《楚辞》中的方言词语极多。如“扈”（披）、“汨”（急）、“凭”（满）、“羌”（语气词）、“侘傺”（失意貌）、“婞婞”（眷恋貌）这些词语是典型的楚地方言。即使在汉代楚地还保存若干。这些楚方言词语通过熟悉方言的学者的注解，我们至今仍然能够读懂。当然也有一部分无法理解其本来意思。当时没有录音设备保存语言，也没有科学的注音符号能把语音记录下来，因此到了汉代，已经没有什么人会用楚方言诵读楚辞了。诗歌讲究语调的铿锵，韵律的和协，声调的高低错落，只有用楚方言朗读才能把楚辞的音乐美充分表现出来，而我们只用今天的读音去读楚辞，其音乐美无法展示。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一时名噪京都；而司马相如则因“能为楚声”而得以为官。到了隋代，还有释道骞也擅长用楚方言读《楚辞》，“音韵清切”，十分动听，有许多人向他学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是语言与音乐的结晶，因此，楚辞和楚音乐、楚方言有血肉不可分的紧密联系。

其次，远在周代，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因此《诗经》对

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诗经》最基本的创作手法“赋”、“比”、“兴”都在屈原的诗歌中运用过，尤其是“比”、“兴”更是在楚辞中发扬光大，有了更加广泛深入的运用。

就现存古代文献来看，至今仍还保存了一些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也就成了楚辞最鲜明的文体特征。因此民间文学对楚辞的影响也很大。

再次，楚人好巫祀，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一定让男巫女巫“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神秘的、原始的宗教气氛。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极大的影响。《楚辞》中的《九歌》，据学者研究，就是根据楚国当地的民间祭祀歌舞改编而成的。由女巫扮演各种神仙，穿着鲜艳的服装，佩带华丽的饰物，在音乐的伴奏下舞蹈、歌唱，旁边还有人唱和，仿佛是一台小歌舞剧。因而又有人以为中国戏剧也起源于这种祭祀歌舞。除《九歌》以外，《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诗人自己的形象的塑造及其高贵品格的象征描写，如峨冠博带，光怪陆离的佩饰，荷衣蕙纕的装扮，大量的神话故事的运用，都说明了楚地原始宗教对楚辞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楚辞是带有浓烈的巫音色彩的宗教。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楚辞的产生与北方中原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开发较早，商、周均建都于此地，这里一直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相比较而言，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发达得多。居于南方的楚国开

发较晚，文化较为落后，一直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但是从春秋初期开始，楚国的疆土日渐扩大，国力逐渐强盛，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楚国的强大，它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于是与北方诸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为中原文化的传入提供了可能。

《国语》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楚庄王让一名大夫去做太子的老师，他拿不定应该教太子学些什么，于是就去请教一个很有学问很有贤德的大夫申叔时。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得，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大意是说，你应该教太子学习《春秋》，扬善抑恶，使其心地善良；应该教太子学习《诗》，让他明白优良的德行，使太子志向高远；应该教太子学习《礼》，让他懂得尊卑老幼的礼节；还应该教太子学习《乐》，让他去掉身上的恶习，使他浮躁的心镇定下来。

这里所提到的《春秋》、《诗》、《礼》、《乐》无疑属于北方中原文化。在楚庄王的时候，楚国大夫已经掌握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并且君王主动地要求太子学习掌握这些本不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可以想见，早在春秋中期，楚国就在自觉地学习北方中原文化。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孟子》上也曾说楚国人陈良，因“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是一直沿续着的，并逐渐深入。

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会盟、聘问等外交场合中，非常讲究外交辞令。“赋诗”在外交辞令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双方外交人员常常通过吟诵一首现成的诗歌来表达一些微妙的意思，或是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意愿。作为一个大国，楚

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楚国的大夫们必须学习流传于北方中原地区的诗。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中，有许多楚人引“诗”的故事。那么，楚辞的产生形成自然会受到北方的“诗”的影响。

屈原曾任楚国的左徒，他长于外交辞令，掌管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等外交事务，曾两次出使齐国，因此无疑屈原对北方的“诗”是极为熟悉的。屈原在创作楚辞之时，会自觉地借鉴吸取“诗”的精华。

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比较多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显然也是受了北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在当时，齐国是学术文化的中心，屈原两度去齐国，也不能不有所感染。

总之，楚辞的产生，一方面吸取了本土文化的养料，如楚地巫祀歌舞、楚方言、楚民间文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比较成熟的北方中原文化，如各种学术思想、神话传说、《诗》三百篇等等。而屈原则在楚辞的产生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屈原是楚辞的创制者。

《离骚》题解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共三百七十三句，约二千五百字。按韵律可分为九十三章，每章四句（末章“乱曰”为五句）。其篇幅之长，居先秦诗歌之首，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算得上是鸿篇巨制。

诗名《离骚》是什么意思，究竟作何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分歧较多，大体上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认为是遭遇忧患。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又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按照这两位杰出的史学家的说法，《离骚》题意为“遭遇忧患”。

第二种：认为是离别的忧愁。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

第三种：认为是牢骚。《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曾摹仿《离骚》作了一篇《反离骚》，按扬雄的理解，离骚即牢骚。扬雄是有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懂方言，因此他的说法也有较多的人赞同。

第四种：认为是歌曲的名称，即认为“离骚”是楚曲。

在以上四种说法中，作者以为第一种说法最为可信。司马迁上距屈原时代最近，不过百年，语言变化不会很大，对屈原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他按照自己对屈原语言的理解加以解释是可信的。而且司马迁的这种解释，在屈原作品中，可以找到其他旁证。

“离”在先秦常常作“遭受”解。在屈原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进不入以离尤兮”（《离骚》），“思公子兮徒离忧”（《九歌·山鬼》），“独历年而离愍兮”等等，其“离”字均作“遭受”解。“骚”字有“忧愁”之意，故司马迁、班固之说较为稳妥可信。

《离骚》是现存全部楚辞中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它集中体现了楚辞的文体特征和艺术特色，因此《离骚》或简称“骚”成为楚辞的代名词。

《离骚》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历代学者说法各一，至今也无统一的定论。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

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因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汉刘向《新序·节士》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由此看来，《离骚》作于怀王时代，屈原第一次放逐之后。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此时他有一种“老冉冉其将至”的紧迫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落后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强大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自己忠心报国而遭受陷害打击以至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心情，熔铸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政治理想有清楚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之路，甚至想要担起统一中国之大任。屈原以其广博的历史知识，列举了重贤任能的兴国贤君和杀害贤臣、放纵淫佚的亡国昏君，希望楚怀王能够在比较中吸取经验教训，效法尧舜“遵道而得路”，切勿效仿“桀纣之猖披”以至“唯捷径以窘步”。诗人的理想是要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那么必须突破由旧的腐朽的贵族阶层把持朝政的局面，大胆改革弊政，诗人在《离骚》中大声疾呼：“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这里所谓“举贤”是指打破一切等级界限，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屈原举了许多例子：“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

度，严格按法度办事，不能偏离法度。因为在当时，楚怀王刚愎自用，随心所欲，政策制度摇摆不定。屈原针对这一政治现实，对楚怀王“背法度而心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主张法治，实行政治革新，这是实现诗人政治理想的手段。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主张，诗人还举反例给楚王以警告：“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即法度不可违，违者必遭致灾祸，夏桀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其政治理想和进步主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反者正是前者的具体体现，这也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

《离骚》是一首难度很大的诗，读通它并不容易。对于初学者，最重要的是扫除字面阻碍，把握全诗大意，掌握其基本内容。至于该诗的艺术成就，创作特点等等倒在其次，待学识修养长进后再探索《离骚》之艺术奥秘也不迟。现在我们着重谈谈《离骚》的基本内容。

《离骚》是诗人自叙性的长诗，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自己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在诗中，诗人自叙了自己高贵的身世；表白了自己美好的德行和节操，同时他也表达了对楚王及其周围重臣的失望；还着重表达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悲痛心情；而最为感人的是诗人对祖国挚爱之情的表达。

《离骚》全诗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在前半部分中，诗人反复倾诉其对于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他要求革新政治、与腐朽贵族集团斗争的强烈意志；后半部分则通过神游天上，追

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国的陈述，反映出他热爱楚国的深厚感情。

从篇首“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忆和追溯。他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叙述了他的出身、生日和名字的含义，说明自己具有美好的品质和远大的抱负。他评价自己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意思是讲诗人自己不仅有天赋的美好德性，而且又特别注重优秀才能的培养。屈原少立大志，极希望施展才能振兴楚国，可是楚国的政治现实压抑着这位难得的人才，以至屈原将老之时还受冷落。眼看时光流逝，人之将老，屈原忧心忡忡：“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正是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使屈原急切地期待着楚怀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屈原寄厚望于楚王，希望他能趁壮年之时，改变现状，骑上骏马，踏上改革之路，而诗人愿意做引路人。诗人的悲剧也恰恰就在于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的身上，一旦楚王仍不“改此度”，诗人当然地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既然把希望放在君王身上，诗人就竭力为之“导夫先路”。他陈列史事，阐明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大量收集人才，而人才聚集的前题则是君主的德行纯粹。“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理想毕竟是理想，不是现实，这种君主贤明，人才聚集的局面只存在于希望和想象之中，现实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现实黑暗如此，诗人该怎么办呢？“岂余身之惮殃兮，恐